

【外交史】

从“联美制苏”到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 政策：中国与中东和平进程(1977-1982)

余纲正

【摘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扩张态势,中国基于“联美制苏”的总体方针在中东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中国积极支援地区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努力,质疑和抵制美苏作为联席主席的日内瓦会议机制,同时反复告诫美国在推进阿以和平时必须平衡双方诉求。中国的这一系列立场与活动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进入80年代,在中国重新思考自身与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暴露出难以客观公允地持续推动中东和平的严重局限。作为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转而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之路,通过加强自身与中东各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支持中东地区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

【关键词】全球冷战;阿以冲突;中东和平进程;“联美制苏”;独立自主

【作者简介】余纲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23.12.51~6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冷战时期的中国与阿以冲突研究”(项目编号:19CSS037)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作为冷战国际关系史中的两件大事,深刻影响亚太地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后续历史走势。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学界都以较为割裂的方式看待这两个事件。随着“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浪潮的兴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冷战研究的史料、视角和对象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拓展,不过,对冷战中后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边问题、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或西太平洋新的安全经济格局等方面,而有关1973年十月战争后中东和平进程

的文献则多关注美国在和平谈判中的作用和失误以及相关各国领导人如何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双层博弈”,既有研究依然很少直接涉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各方的主要考量动因及其相应的政策影响。^①同时,尽管有关中国在整个冷战时期对第三世界外交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朝鲜半岛、东南亚等邻近地区或作为“觉醒的大陆”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而关于中国对中东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型研究依然比较薄弱。^②

近年来已解密的各方外交档案以及新出版的多位当事人年谱、传记和回忆录等,为剖析1977年到1982年以阿以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深入探讨中国在其中的一系列立场和活动提供了可能。^③通过研究大量相关史料,本文尝试对中国在中东地区问题上从“联美制苏”到奉行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政策的重大转变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也为考察中美在全球事务中的复杂联系、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演变以及中国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提供新的视角。^④

一、“联美制苏”战略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

纵观20世纪70年代世界政治中的两极格局,总体上处于“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在全球多个区域广泛出击进行战略扩张的同时,苏联也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部署重兵,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国防威胁。^⑤到1977年,中国的新领导层仍然坚持着毛泽东时期确立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即中国应与其他国家一道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苏联的扩张势头。这一外交战略自然也为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设定了基调,即指责超级大国是导致该地区局势紧张和冲突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具体到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冲突的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持续表达对阿拉伯方面的支持,并经常对以色列展开批评。不过,此时中国关注的焦点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领导下的埃及。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难以调和,萨达特最终于1976年正式废止了作为两国同盟基础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中国将埃苏关系的恶化视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一大挫败,期待埃及的行为将成为更多中小国家反对“苏修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新的开端”。^⑥

中国不仅在政治表态上积极支持埃及,而且也以实际行动对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试图压服埃及,苏联政府扣押了埃及空军送返苏联进行检修的120台飞机发动机。在收到埃及方面的求助信息后,中国以最快速度向埃及免费提供了30台仿制的米格-17飞机发动机,随后又赠送了一批战机、坦克及相关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填充了埃及由于苏联“卡脖子”而造成的国防力量缺口。^⑦萨达特毫不掩饰他对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支持的感激态度。在1977年4月和美方的会谈中,萨达特表示中国制造的武器质量完全不输苏制装备,并且中国基于米格-19改进的歼-6战斗机实际上“比苏联原版的航程还要更远”。^⑧

当中国和埃及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因为共同的立场而联系日益紧密时,1977年美国也开始了新一轮调和阿以冲突的尝试。此前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曾通过“穿梭外交”的方式促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两项临时性的脱离接触协议。不过由于国内外一系列事件和丑闻的影响、特别是接连受到水门事件和南越政权覆灭的冲击,美国行政当局没有办法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中东事务之中,阿以双方的和谈也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到了1977年1月,吉米·卡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卡特和他的副总统搭档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当选前后的多个场合都表示,其政府的总体目标是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及解决阿以冲突是其中重点关注的两个方面。^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问题成为中美之间在会谈磋商中不可或缺的话题,特别是美国试图就其重启阿以和谈的努力获得中国方面的理解和帮助。卡

特政府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1977年8月首次访问北京时就直接呼吁中国在新形势下与美国就中东问题展开合作,强调“中东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你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⑩而根据卡特和万斯的最初构想,美国在启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召开曾于1973年底举行、由美国和苏联担任联席主席的中东问题日内瓦会议。^⑪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中国欢迎美国在解决中东地区持续冲突和动荡的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中东和平进程能顺利启动,那么至少将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其一,中国认为,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中东将使苏联难以对该地区实施渗透并施加影响。^⑫其二,中国的官方立场仍然是坚定支持阿拉伯方面收复失地的“正义斗争”和恢复“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考虑到之前在美国斡旋下的两项埃及脱离接触协议都在西奈半岛得到落实,所以美国对阿以全面和平的承诺的确为阿拉伯人进一步以和平方式收复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创造了一个机会。^⑬

尽管中国在总体上对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持积极态度,但也在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自身的意见与担忧。第一,中方严肃地告诫美国一定要“用双手”来处理中东和平问题,即要对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采取公平公正的态度和政策。特别是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首次在大选中击败了自建国后就连续执政的中左翼工党。一开始中国对这一变化流露出相当负面的看法,因为利库德集团主导的右翼政府似乎比以色列之前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排斥向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⑭尤其在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公

开承诺美国不会通过威胁减少军事援助来诱使以色列放弃所占领的土地后,中国更加担心美国可能无法有效限制以色列新政府的对抗性举动。^⑮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万斯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你们能约束住以色列,那么美国(在中东)的优势或许还能维持得更久一些……但如果不能的话,那(地区态势)就将再次发生变化。”^⑯万斯在回应时向中方保证,华盛顿“想要公平地对待争端双方”。他指出美国不仅向埃及提供军事装备,还每年拿出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来帮助萨达特总统“维持他的经济和社会计划”。^⑰万斯还表示,美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都与以色列的新总理意见不一致。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应该回到1967年的边界,其中仅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边界)稍作一些调整(minor modifications)”。^⑱

第二,中方关心巴勒斯坦问题是否能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而在未来得到妥善解决。当时中国与巴解组织的关系正处于低谷,特别是对巴解内部派系林立的状态和其组织的有效性颇有微词。^⑲同时,中方也对当时巴解组织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并不满意。1977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北京接见由阿布·杰哈德(原名哈利勒·瓦齐尔)率领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时就多次点名指责苏联“破坏阿拉伯团结”,巴勒斯坦方面则非常谨慎地并没有附和。^⑳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中国政府仍然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奉为自身中东政策的标杆和旗帜。^㉑考虑到美国政府尚不承认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中方专门提醒美方应该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制造更大的障碍。对于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担忧,美方在回应时选择避实就虚,重申坚信“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中东问题”,并且支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或家园(a Pal-

estinian entity or homeland)”。^②

第三,中方对美国通过日内瓦会议这一机制来解决中东问题的计划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中国领导人认为,既然中美当前在中东共同的基本利益是抵制苏联的战略扩张,那美国方面邀请苏联来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明显偏离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目标。^③更重要的是,此前的中东问题日内瓦会议作为并不完善的多边机制就已经暴露出了效率低下的不足。特别是这时阿以冲突问题牵扯多方,在各方都有自身利益和复杂算计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使会议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拉扯。中国担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只会有利于苏联在中东地区进行重新布局。黄华在和美方的会谈中就提出,如果“拖延太久”只会造成中东各方政治上的不稳定,“而那将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提供可乘之机”。^④不过,一向极力主张优先缓和美苏关系的万斯对这一劝诫不以为然,在与中方的会谈中反复坚持“在年底前召开日内瓦会议始终是一个可行的目标”。^⑤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加上万斯又以“最大限度”试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最终使其在1977年夏天的访华之旅不欢而散。

和中国一样,埃及方面也对日内瓦会议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明确质疑。因为单就是是否应该允许巴勒斯坦代表前往日内瓦参会的问题上,叙利亚和以色列两国就存在着几乎完全无法调和的矛盾。1977年10月10日,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多次强调拒绝巴解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而叙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卡达姆(Abdul Halim Khaddam)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如果不邀请巴解组织,那叙利亚也“永远不会去日内瓦”。^⑥在这样的僵局下,面临国内经济重压而渴望早日达成和平的萨达特对重开日内瓦会议的

进展愈发悲观,抱怨日内瓦会议机制下的“程序性问题已经盖过了和平的实质性要素”。为了“加大力度使和平进程能够加速迈向最终解决”,萨达特在11月初写给卡特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方案,即迅速地争取在1977年底在东耶路撒冷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中东问题国际峰会,直接邀请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以及中东地区有关各方代表前来参加。^⑦当萨达特很快意识到这个激进的峰会倡议注定无法实现之后,他决定亲自前往耶路撒冷。在全世界震惊的目光中,萨达特于1977年11月20日抵达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他在以色列国会的演讲中宣布,在之前四次中东战争中始终站在反以第一线的埃及现在愿意接受与以色列的和平。^⑧

中国密切关注萨达特的以色列之行,《参考消息》从1977年11月20日到24日每天都用了至少一半的版面来密集介绍各方对埃及总统访以的反应。虽然黄华在中美对话中私下里赞赏了萨达特敢于行动的精神,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达对访问的支持。萨达特这次历史性的36小时访以行程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解组织与叙利亚、利比亚、民主也门(南也门)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频繁互动,最终建立了“坚定与对抗阵线”(Jabhat al-Sumud wal-Tasadiy)以反击埃及方面的“背叛”。^⑩苏联为了避免自身在中东问题上被边缘化,很快开始给对抗阵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抨击埃及的“投降主义政策”。^⑪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较为支持其主导和平进程的那些地区“温和国家”和对抗阵线之间的矛盾在当前已难以调和。同时美国也无法忽视这一事实,即

其中东地区的所有主要合作伙伴都对苏联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此外,1977年到1978年在非洲之角爆发的欧加登战争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卡特政府也必须重新评估苏联是否真有意愿在第三世界与美国进行“缓和”与“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根据形势发展在中东问题上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卡特政府希望通过更多的援助来鼓励“温和国家”保持并加强和平进程的势头。^③1978年初,美国参议院批准了白宫提出的向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三国出售价值48亿美元军用飞机的决定。^④另一方面,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一份内部文件中不得不承认,“我们之前向中国人表示通过召开日内瓦会议将取得(国际和地区安全方面的)进展,但这种乐观态度现在已经被证明其实是没有根据的”。^⑤

不久之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开始对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事实上自出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之初,布热津斯基就谋求迅速与中国建立安全合作关系以对抗苏联。因此,相较于前一年万斯访华时所提出的中美两国在中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模糊构想,布热津斯基在这次访问中提出的和平进程新愿景明显更符合中国方面的期望。布热津斯基在与黄华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当前在中东“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反制苏联的强大联盟——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和以色列”,并且“我们在该地区的和平努力”将始终不忘这一战略目标。^⑥

中方在会谈中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即“一个不受苏联影响的中东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的中东”,并同时敦促美国政府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机会“立即行动起来摆脱被动局面”,特别是应该向以色列方面施加更多压力来满足阿拉伯人的诉

求。^⑦随着会谈的深入,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中国能在两方面为当前的和平进程做出贡献。一方面,美国请求中国向对抗阵线施加影响以缓和局势。布热津斯基告诉黄华,“无论你们能做什么——只要能够缓和阿拉伯人的态度”,都将是“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削弱苏联影响力做出的重大贡献”。^⑧另一方面,华盛顿希望中国不仅能够维持与埃及的关系,还能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其他“温和国家”建立联系。布热津斯基特别试图说服中方应认识到贝京是现代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反苏的以色列总理,并且中以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都将有助于实现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美国方面之所以试探促成中以联系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出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考虑。卡特政府一直担心活跃在国会山的台湾游说集团“会将亲台情绪与以色列游说集团联系起来”,从而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努力。^⑨布热津斯基也同意,如果以色列与中国建立联系,那能让白宫更好地应对与国会围绕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可能展开的政治争斗。^⑩不过在访华期间,布热津斯基没有直接透露这层考虑,而是试图给中方“戴高帽”。布热津斯基对黄华表示,“鉴于中国的崇高威望和重要性”,如果能有某种方式向以色列人传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将有利于中国直接影响以色列方面的态度。中方则是冷静地回应,中国不可能声称自己对以色列有影响力,而且也并不打算这么做。^⑪

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经历了12天的秘密磋商之后,萨达特和贝京代表埃及两国在卡特的见证下签署了两项历史性的协议,即《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天之后,卡特在白

宫热情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④美国总统在会面中心情愉悦地介绍了中东和平进程的最新成就,并期待中国方面能继续支持,“让我们进一步努力”实现中东地区问题的全面解决。卡特对柴泽民表示,“鉴于中国的影响力,我请求你们能通过与阿拉伯领导人以及其他所有希望在这个动乱地区实现和平的人(的联系)来给我们提供帮助”。^⑤

从中国方面来看,戴维营谈判具有“积极因素”,对苏联而言是一个“重大打击”。^⑥但其结果远非完美,正如1978年10月黄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对万斯表示的,目前的框架协议未能满足“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些正义诉求”,从而在中东地区给苏联留下了不小的回旋余地。^⑦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愿意与美国就如何继续推进和平进程进行协调。中国尝试劝说阿拉伯方面、特别是抵抗阵线的成员不要过分敌视埃及。根据中国驻中东国家外交官们的回忆,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阿拉伯政府和人民“做工作”,避免阿拉伯人之间的进一步分裂。^⑧中国领导人在北京接待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代表团时也反复劝说希望他们多了解埃及面临的困难,不要轻率地将其孤立起来,否则阿拉伯人很可能会落入苏联的陷阱,即“牺牲民族独立”但最终却只为超级大国的利益服务。^⑨为了照顾巴解组织和对抗阵线其他成员的情绪,中国官方也没有直接对戴维营协议发表评价,媒体上只是委婉地强调埃及人民“支持萨达特总统为中东和平所做的努力”。^⑩

二、中国与中东地区关键国家加强联系的努力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也是首次正式把加

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列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⑪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在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后宣布将于1979年的第一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将终止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

从1979年1月29日起,邓小平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华盛顿特区的会谈中,卡特与邓小平讨论了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在内的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问题。卡特首先专门感谢中国对于和平进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在过去几年中“对萨达特总统非常勇敢的行动的鼓励”。邓小平肯定了中埃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但也不忘提醒卡特:中国之所以可以既支持萨达特的和平努力,但同时又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保持良好关系,其关键在于萨达特仍然坚持必须“归还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以及“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权利”。考虑到目前埃及和以色列和谈的进展,邓小平表示中国认为对抗阵线的力量“正在加强而非减弱”,而苏联方面也在利用他们。卡特在会谈中重申,他决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争取促成以色列与约旦和叙利亚两国的和平协议。同时,卡特也再次询问中方是否有可能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形式的沟通渠道。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客观的现实”,没有道理否认其存在。但是目前中国没法和以色列建立联系,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在中东)开展任何工作”。^⑫

总体上看,邓小平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双方达成多项重要的合作协议。同时对于中东地区那些与美国有着紧密政治军事合作关系的国家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和中国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最终使这一时期中国与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联系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

首先对于中以关系而言,虽然在访美期间中国领导人否认了与以色列公开进行互动的可能性,但事实上中以双方的秘密沟通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在邓小平结束访美后不到两个星期,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79年2月打响。同月,一架没有涂装标记的波音707客机搭载着一批以色列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军工企业的高级代表飞抵中国。^⑤虽然尚不清楚中越两国在边境地区激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方批准这次秘密访问,但至少有几个因素在中国和以色列之间建立接触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以色列的贝京总理和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政府多次表达了与中国方面建立联系的意愿。早在1977年7月,贝京就明确向万斯表示,以色列“愿意与中国大陆建立关系”,并希望美国能够在这方面提供帮助。^⑥1978年8月当华国锋访问东欧时,贝京又通过以色列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阿巴·格芬(Abba Gefen)向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提出了类似的请求。随后在布加勒斯特和北京,这位与以色列保持友好接触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多次向中方提起此事,试图为中以关系正常化发挥斡旋作用。^⑦

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决定开始从西方引进新技术来对既有武器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⑧虽然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边境冲突已过去数年,但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中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乃至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依然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⑨不过由于资金短缺且担心与北约体系不兼容,一直到1979年中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军备采购尝试都进展得并不十分理想。^⑩因此,以色列在武器价格上的比较优势以及对苏式装备改造的丰富经验使其成为中国尝试进行合作的理想伙伴。^⑪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在经历了70年代中期双边军火贸易的上升期后,以色列尝试向中国台湾地区扩大武器销售的努力在此时遭到挫折。^⑫1978年,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srael Aircraft Industries)开始加紧向中国台湾地区推销其“幼狮”(Kfir)战斗轰炸机,其首席执行官加布里埃尔·吉多尔(Gabriel Gidor)专门向蒋经国赠送了英文版的《希伯来圣经》作为礼物,并在扉页上特意写下“我们随时准备提供帮助”。^⑬美国政府此时也解除了对幼狮战机的销售禁令。然而,蒋经国向美方表示“不打算去以色列、或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购买(有关战机的)新型设备”,因为这会导致维护和供应问题。^⑭这场交易的失败,加之同时期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终止大批量采购以色列武器,促使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等以色列重点军工企业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新市场,吉多尔也成了1979年2月登上飞往中国飞机的首批团队成员之一。^⑮这架飞机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起飞,在印度加尔各答短暂停留并加油后飞抵广州。^⑯一组中方领航员在广州登机,并最终指引飞机抵达北京。随后中以双方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紧张谈判,为两国未来的军事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事实证明,以色列方面的此次访华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美国国务院最初也对此毫不知情。^⑰

在1979年上半年,不仅中以军备合作取得突破,中埃军事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向国外提供军事装备一直都是以无偿转让或赠予的方式进行。但到1978年当邓小平表示中国应该引进更先进、特别是与空军相关的技术来对现有军事装备进行升级换代时,来自国防工业的报告指出飞机行业缺乏足够的外汇完成这一任务,而之前的受援国仍然持续要求中国免费

提供更多的军用产品。邓小平表示看来中国必须也要学会当“军火商”，即不应该排斥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军品交易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1979年1月21日正式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1982年更名为航空工业部)成立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中航技，即China National Aero-Technology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或CATIC)，专门负责中国航空产品的外贸业务。1979年1月埃及向中方询问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飞机、发动机和零部件。中航技的工作人员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就军品销售展开商业谈判，并请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和武官孙丕荣帮助联系埃及政府和军方领导层。在时任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大力支持下，埃及方面最终接受中方提议，两国于5月签署了总成交额为1.67亿美元的两份合同。中国总共将向埃及出口44架歼-6飞机、6架歼教-6飞机、220台涡喷-6发动机、28台涡喷-8发动机，同时提供相应的备件供应和发动机维修服务。^④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首笔飞机军售出口协议，并且2700万美元的预付款在同年7月就以电汇方式快速到账。这批合同的签署为中国进行军品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中国军工企业在未来进军中东武器市场开辟了道路。^⑤

不过相较于中国与以色列和埃及关系的进展，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互动显得更为曲折。实际上，与此前中方看似冷漠地回应美国建议中以建立联系的态度相比，中国其实对中沙关系的突破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在和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黄华就表示中方可以公开表达与沙特建立某种联系的愿望，并且询问美国是否也可以对沙特施加相应的影响。^⑥1978年下半年，中方在宣传上向沙特发起了一波密集的示好。《人民日报》专门以大篇幅称赞沙特

阿拉伯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经济援助不仅促进了“阿拉伯和非洲合作”，还增强了这些国家“抗击侵略的能力”。^⑦这些报道除了称赞沙特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前线国家以及巴解组织提供的大量财政援助，还指出其向亚非拉许多国家提供贷款，支持了这些国家在“工业、农业、水利、电力、交通、教育等许多方面”的建设项目。

然而，沙特阿拉伯此时对中国大陆方面的示好反应冷淡，反而在美台官方关系终止后加强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联系。1979年1月，沙特阿拉伯曾多次请求美国承诺保护沙特免受苏联的任何直接威胁。^⑧到了2月份，南北也门之间的摩擦升级为全面战争，沙特担心苏联支持的南也门会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选择加大了对北也门包括F-5E轻型战机在内的军事援助，并开始试探向中国台湾地区请求派遣飞行员前来支援的可能性。最终，中国台湾地区派遣了80名空军飞行员身着沙特皇家空军制服、持沙特护照前往北也门首都萨那。这些飞行员在萨那街头甚至还多次与中国大陆支援北也门的工程和医疗队成员相遇。^⑨考虑到这一情况，中国在1979年基本停止了官方宣传工作上对沙特的示好，取而代之的是以更加柔性的方式重新恢复了前往圣地的朝觐活动。实际上这个举动给沙特方面带来了相当不错的观感，也为后来两国逐步建立互信打下了基础。^⑩

1979年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条约。这宣告两国之间持续30多年的战争状态结束，但同时也给中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考验。无论萨达特如何努力解释这一条约具有“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意义，愤怒的情绪依然在阿拉伯世界蔓延开来。^⑪不久，阿拉伯联盟暂停了埃及的会员资格，对抗阵线的势头更加强劲。而令华盛顿失望的是，

阿拉伯世界的“温和国家”在公开场合对和平协议也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或支持。因为面对不少民众对于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的不满,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宗教动荡浪潮,沙特和约旦两国此时都对其君主统治的稳定性深感忧虑。因此,这两个王国也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起断绝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①

尽管中国一直都对阿拉伯世界反对萨达特的声音保持关注,但局势的发展显然还是让中方在此刻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此,中国政府没有明确对埃以和平条约公开表态赞成或反对,而是试图在私下安抚那些愤怒的阿拉伯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谨慎地表达了对和平条约中一些积极元素的认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们在不同场合反复重申北京坚定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但也希望阿拉伯国家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利益着想不要进一步孤立埃及。^②1979年9月下旬,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时,相对直接但仍然谨慎地对和平进程的局势进行了点评。实际上邓小平的表态也通过特鲁多向外国媒体传播,很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邓小平在和特鲁多的谈话中表示,他理解以色列和埃及为什么要寻求和平,所以不会因此而指责他们。邓小平同时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反对过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也“并不建议美国放弃以色列”,但在中东地区遏制苏联的最好办法就是美国改变其目前在阿以问题上的政策态度,尤其是需要支持至少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实体。^③三个月后,在1980年1月的严冬中,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前来北京访问的穆巴拉克夫妇,再次展示了中国与埃及之间的政治互信。很快中埃两国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其中也包括中方将向埃及出口更多的战机和

航空涡轮喷气发动机。^④

三、迈向独立自主的地区和平政策

虽然中国希望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能够成为真正解决阿以冲突的先导,但在短期内局势并没有完全依照这样的预期方向发展。从1980年年中开始,虽然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保持平稳,但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为了安抚右翼选民因西奈半岛归还埃及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贝京选择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以色列议会于1980年7月通过了名为《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的新基本法。这一试图吞并东耶路撒冷的举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谴责。《人民日报》载文批评利库德集团政府“色厉内荏”,故意通过加剧紧张局势来转移以色列民众对本国经济不满的注意力。^⑤8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美国)的结果通过第478号决议,宣布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基本法“无效”并且“必须废除”,同时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耶路撒冷撤出其外交使团。^⑥1981年,以色列不仅与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发生激烈交火,并且直接攻击叙利亚军队以支持黎巴嫩境内的马龙派武装,这些举动均引起了中国媒体的负面评价。1981年6月以色列空军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张杰更是向伊拉克驻华大使表示,中国穆斯林坚决支持“伊拉克人民和穆斯林兄弟们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⑦

在阿以矛盾再度激化的同时,中美关系也面临着新的困难。自1979年年底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后,中国认为卡特政府的反应软弱,反复与美方沟通直到美国最终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先进雷达和电子计算机在内的非致命性军事装备,并且也不再反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盟国对华出售包含美国零配件的

武器和军用装备。^⑧但到1980年下半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在大选中占据上风并最终于11月赢得选举。虽然里根倾向于对苏联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但此时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相较于卡特显得并不友好。特别是里根竞选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态度强硬,甚至威胁要考虑与中国台湾地区重新建立官方关系。这些都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双边关系有倒退甚至彻底崩溃的风险。^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渐重新强调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以期在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之外获得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⑩198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对外政策时就决定,今后要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工作。^⑪在阿以冲突的问题上,中国依旧呼吁阿拉伯世界加强团结,但也开始更加积极地恢复与巴解组织的联系。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在开罗举行的年度胜利阅兵中遇刺身亡。^⑫虽然穆巴拉克副总统很快接替萨达特并控制住了局势,但在此情况下埃及更加不可能像萨达特曾经承诺的那样,在推动阿以全面和平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10月7日阿拉法特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十多年来首次访华行程。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双方进行了较为坦诚的沟通。邓小平在会见阿拉法特时专门指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非常重要,但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是离不开埃及的。他希望巴解组织在处理同埃及的关系时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⑬中国对于巴解组织的这一轮支持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达到了一个高潮。1982年6月,以色列以驻英国大使被枪击为名,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并且迅速推进到贝鲁特郊区。中国各大媒体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及其进一步加剧黎巴嫩内

战乱象的后果展开抨击,特别是对9月中旬发生在贝鲁特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进行了严厉谴责。^⑭

从1982年年中开始,伴随着对本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国领导人更加频繁地表示他们将修正此前在超级大国之间“非杨即墨”的政策倾向。1982年8月21日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时,邓小平着重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三个重点,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邓小平指出,无论是霸权主义横行还是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都是第三世界,因此,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虽然力量和作用有限,但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⑮除了考虑第三世界在“改变国际政治力量平衡”中的重要性之外,中国领导层还开始更加认真地研究和讨论第三世界市场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长远意义。^⑯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并且明确新时期的外交路线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⑰自此,“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被“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所取代。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邓小平的解释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但他特别强调,无论是从国际声誉还是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都绝对不当第三世界的所谓“头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

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⑧

在与超级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也更加坚持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空洞的言辞。一方面,由于入侵阿富汗后政治孤立和经济困难日益加剧,1982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去世前发表“塔什干讲话”,成为苏联方面为试图解冻中苏关系所释放的信号。不久之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领导人的葬礼并同苏联外长举行会谈,取得了中苏关系迈向正常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⑨同时,北京和华盛顿在经过数月的紧张谈判后,最终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一份在解读上有一定灵活性的联合公报。^⑩在以这种方式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模糊的共识后,中美双方高层得以暂时搁置分歧,重新致力于在安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等许多方面改善和加强双边关系。

虽然中美两国就双边关系达成了新的谅解,但中国逐渐对美国进一步斡旋阿以冲突以实现中东和平一事失去了信心。在1981年年底时,中方认为上台不满一年的里根新政府基本继承了卡特政府开启的和平进程与埃及戴维营协议,“并且想逐步扩大参加国的范围,预示最终还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打交道”。同时希望美国“如能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则对缓和这个战略地区的各种矛盾,减少苏联浑水摸鱼的机会,将起着积极作用”。^⑪但随着1982年一年里美国政府在面对黎巴嫩战争时进退维谷的表现,中国对美国推进中东和平的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一方面,在对于中东和平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复杂问题上,美国政策的稳定性表现出容易受到两党制下领导人更迭严重影响的一面。相较于卡特,里根自己其实并不关心中东问题。就连其亲密

盟友、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评价,里根似乎从未对中东地区表现出“丝毫兴趣”。^⑫另一方面,在黎巴嫩战争全面爆发后,里根政府匆忙推出所谓关于中东和平的新倡议。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一倡议,而美国政府也无能为力,这使其在约束以色列行为方面的无能暴露得更加明显。^⑬到了1982年底,中国明确指出,美国政府依旧忽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愿望,因此肯定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解决阿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里根政府所谓的新方案“并未作实质性改变,仍是偏以轻阿”,所以不可能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⑭更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的中东外交构成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限制和阻碍。《人民日报》在1982年就专门评价,“美国政府内外,各种权势集团,各种谋士、说客,应有尽有”。在里根入主白宫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保守主义利益集团主张里根政府应该“以保守主义治天下”,而对于像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主义,“都视为异端而主张必须消灭之为快”。^⑮

鉴于美国缺乏在可预见的未来为中东带来真正和平的能力,中国决定不再追随或积极配合美国的地区政治秩序设计,而是更注重发挥自身优势与该地区所有各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推动中东地区在未来达成真正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在黎巴嫩战争期间中国毫不讳言地对以色列的一系列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但80年代初中以之间的军事关系仍在持续发展。第一批以色列制造的先进坦克炮弹在这一时期运抵中国,加强了中国在北方边境防御中的装备力量。^⑯同时,五次中东战争的实践和教训也证明,军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阿以和巴以冲突问题。^⑰因此,中国密切关注地区政治的发展与局势缓和的迹象,尤其是阿拉伯方面任何以集体方式主张

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提案。

其实在1981年,中国就已经注意到沙特王储法赫德(一年后继位成为沙特国王)提出的和平计划,并将其视为“解决长达3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明确建议”。^⑧1982年9月,阿拉伯联盟在摩洛哥的非斯举行第十二届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推动下,会议制定和发布了名为《中东和平计划》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呼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同时也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⑨中国认为该文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和平谈判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正确出路,因此对非斯方案持非常正面和积极的评价。《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评价非斯方案是“自从1948年阿、以争端发生以来,阿拉伯国家共同提出的第一个建设性的、比较现实的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是广大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意愿的明确体现”。^⑩

与此同时,阿拉伯方面也期待自身的集体倡议得到各个大国的支持。因此在1982年1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率领阿拉伯高级别联合代表团访华,同行的还有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以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六国的外交部长或大臣。这次访华行程专门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从12月5日开始的两天时间里,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轮流会见了阿拉伯联合代表团。在会谈中,侯赛因国王直接指出非斯方案的第七条提及“这一地区各国”就是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并且明确希望中方理解和支持这一试图通过和平方式全面解决阿以争端的计划。^⑪中国总理对阿拉伯方面以如此高规格的方式前来通报情况深表感谢,并回应中方完全赞赏和支持非斯方案。

中方重申了本国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三个根本性立场,即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自决权应得到恢复,以及中东各国都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活动,中方也表明自身越来越有兴趣发展与阿拉伯方面的经济联系,而不仅仅只是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中方在会谈中反复强调,中国人民同阿拉伯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无论在反帝、反殖和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的斗争中,还是在发展民族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这种更加注重经贸合作的意向也体现在中国外长与阿拉伯六国外长的单独会晤上。黄华借此机会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进行了长谈,表达了中方与沙特加强民间友好交流的愿望。这一次,沙特亲王感谢中国支持法赫德国王的和平计划和阿拉伯人的“正义事业”,并同意随着中沙经贸文化关系的不断发展,未来两国建交自然会“水到渠成”。^⑫

从12月7日起,这次访问的第二阶段活动开始,即约旦侯赛因国王正式开始了自1977年中约建交以来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约旦国王向中国领导层详细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关理念和目标,并认为中国的发展计划对约旦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在和邓小平的会面中,侯赛因国王一直笔挺端坐。他的礼貌举动以及对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浓厚兴趣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⑬在侯赛因国王告别后,邓小平私下和中方翻译称赞道,这位国王彬彬有礼,颇有“绅士风度”。^⑭在这次会晤双方极为友好的氛围的推动下,中国与约旦的贸易合作开始驶入快车道。^⑮从更宏观的范围来看,中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额

已经从1977年的约8.5亿美元大幅增长到1982年的33亿美元。同时,为了更好地探索和理解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全国性的中国中东学会也于1982年成立,并在此后逐步成长为推动中国中东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机构。

结论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苏联加大了对全球多个区域的战略扩张,而美国卡特政府则谋划缓和阿以冲突,并为此积极寻求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将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平计划视为遏制和削弱苏联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的机会。不过,中国并没有被动和消极地等待计划实施,而是在向埃及提供大量政治和物质支持的同时,积极敦促美方放弃重启美苏作为联席主席的日内瓦会议机制并平衡阿以双方诉求,最终有力地推动了和平进程的启动。

在这一过程里中国与埃及、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重点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而出于一系列国际和国内考虑,美国也鼓励其中东盟友与中国建立联系。然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和双边和约并没有给整个中东带来全面和平,1980年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法》和1982年爆发的黎巴嫩战争反而恶化了地区局势。在中国看来,地区冲突困境与和平进程僵局的主要问题正是在于美国既没有充分尊重阿拉伯人的诉求也未能很好地约束以色列的行为。虽然美国试图证明有足够的决心和力量阻止中东局势走向完全失控,但却缺乏给该地区带来真正持久和平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从80年代初起,中国逐步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超级大国之间不再“非杨即墨”。而随着超级大国对中东的关注度降低,中国不愿再追随或积极配合美国的地区政治秩序设计,而是把大部分精

力投入到与该地区各方培育更具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上,这也成为中国“告别冷战”历史进程的又一例证和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冷战”(Global Cold War)概念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冷战年代里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影响。^①本文也同样尝试揭示一些在常见的冷战大国关系叙事中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线索。

比如中国在这一时期与埃及和以色列的军备合作关系中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务实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经济建设而削减国防开支,军工领域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保持生产线运转的同时引进技术以追赶世界先进潮流。因此,中国对埃及的军事装备出口以及以色列对华武器与技术转让可以说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同时,即使是中美关系史这一热门学术研究领域也依然有众多新课题的拓展空间。特别是在冷战中后期,中美在各种问题上的相互交流既塑造着两国看待彼此的方式,也影响了各自对世界不同地区政策的形成。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深入探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动因及影响,不仅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去考察中美在全球事务中的复杂联系、中国和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演变以及中国主动“告别冷战”的历史进程,或许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直到今天中国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对于地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的不懈追求。

注释:

①对冷战中后期中美关系的研究主要参见Encco Fardella,

"The Sino-American Normalization: A Reassessm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3, No. 4, 2009, pp. 545-578; Chen Jian,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fter Mao",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End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1-200; Robert S. Ross(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樊超:《1979年中国对美政策讨论与中美互动》,《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有关1973年十月战争后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主要参见 William B. 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05; Salim Yaqub, *Imperfect Strangers: Americans, Arabs, and U.S.-Middle East Relations in the 1970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Galen E. Jackson, "Strategy and Two-Level Games: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Road to a Separate Peace, 1977-197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9, No. 3, 2017, pp. 160-195; Nigel Ashton, "Taking Friends for Granted: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Jordan, and the Camp David Accords, 1977-1980", *Diplomatic History*, Vol. 41, No. 3, 2017, pp. 620-645; Craig Daigle, "Sadat's African Dilemma: Libya, Ethiopia, and the Making of the Camp David Accords", *Cold War History*, Vol. 19, No. 2, 2019, pp. 295-313.

②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Gregg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Shao Xiao, Xiaoming Zhang, "Reassessment of Beijing'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 to Hanoi's War, 1964-1975", *Cold War History*, Vol. 19, No. 4, 2019, pp. 549-567; Jodie Yuzhou Sun, "'Now the Cry was Communism': the Cold War and Kenya'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64-1970", *Cold War History*, Vol. 20, No. 1, 2020, pp. 39-58; 时伟通:《中国对老挝援助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1956-1965)》,《世界历史》2021年第6期。对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

中东战略或政策的研究,参见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Gangzheng She, "The Cold War and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3-1975",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22, No. 1, 2020, pp. 125-174; 钮松、胡丹妮:《博弈1971: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中国中东建交新突破的双向互动》,《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2年第2期。

③ 此前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多只能依靠各国政府的官方表态或新闻报道。John Calabrese,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London: Pinter, 1991, pp. 82-130;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1993, pp. 125-244;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104-118, 213-227; Yitzhak Shichor, "Just Stand' and 'Just Struggle': China and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5, 1981, pp. 39-52.

④ 关于“告别冷战”这一命题,参见牛军:《“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 牛军:《中美关系与东亚冷战》,《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⑥ 《苏联霸权主义在埃及的破产》,《人民日报》1976年3月16日,第6版;《埃及人民的怒吼》,《人民日报》1976年3月19日,第1版。

⑦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5,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January 1977-August 1978*, No. 27.

⑧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pril 5,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January 1977-August 1978*, No. 27.

⑨ "Remarks by Jimmy Carter", March 15, 19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I,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No. 4; "Address by Vice President Mondale", June 17,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

1980, Volume I,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No. 44.

⑩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4,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9.

⑪ Ismail Fahmy, *Negotiating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Abingdon: Routledge, 2014, pp. 190-191.

⑫ "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Aaron)", December 16,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70.

⑬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4,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1,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9; 《埃及接管西奈半岛的阿布鲁迪斯油田等地》,《人民日报》1975年12月5日,第4版。

⑭ 《巴勒斯坦人民的铁拳》,《人民日报》1977年7月1日,第5版。

⑮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3,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8; "Address by Vice President Mondale", June 17,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I,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No. 44; "Secretary Vance Interviewed on 'Issues and Answers'", June 19, 1977,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ume LXXVII, No. 1986, Washington: Office of Media Services,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July 18, 1977, pp. 81-82.

⑯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4,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50.

⑰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3,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8.

⑱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4,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9.

⑲ "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Aaron)", December 16,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70.

⑳ 《阿布·杰哈德团长率巴勒斯坦革命代表团到京黄华外长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巴勒斯坦战友》,《人民日报》1977年6月28日,第4版。

㉑ 《巴勒斯坦人民的铁拳》,《人民日报》1977年7月1日,第5版。

㉒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3,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8.

㉓ 在1974-1975年担任第一副总理期间,邓小平就已经在中美高层会谈中表明了他对两国在中东具有共同利益的看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20, 197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I, China, No. 122.

㉔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4,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9.

㉕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3,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8; See also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8-79.

㉖ "Dayan Tells UN Assembly Israel Has Changed Its View on Territorial Concession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1977-10-11; Marvin Howe, "Syrian Insists PLO Attend Geneva Talk", *New York Times*, 1977-10-11.

㉗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Egyp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3,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January 1977-August 1978, No. 141.

⑳ William Cleveland, Martin Bunton,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6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7, pp. 383-384.

㉑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1,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9.

㉒ Yehuda Lukacs(e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 Documentary Reco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66-469.

㉓ 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630-640页。

㉔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4,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January 1977-August 1978, No. 176.

㉕ *Congress and the Nation, 1977-1980, Vol. V: The 95th and 96th Congresses*, Washington: CQ Press, 1981, pp. 63-64.

㉖ "Paper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undat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6.

㉗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0,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8.

㉘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1,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9.

㉙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0,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8.

㉚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ezizinski)to President Carter", July 29,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40.

㉛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ezizinski)to President Carter", January 25,

19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96.

㉜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1,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9.

㉝在担任驻美联络处主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大使之前,柴泽民曾于1970年6月至1974年8月间任中国驻埃及大使。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后,柴泽民应埃及政府的邀请前往苏伊士运河沿岸视察此前以色列军队部署的阵地,但在行程中遭遇车祸受伤。柴泽民、温志宏、刘梦羽:《首任驻美大使:怀念的二三事》,《中国报道》2009年第1期。

㉞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9,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35.

㉟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3,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38;《警惕苏联破坏阿拉伯团结》,《人民日报》1978年11月8日,第6版。

㊱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ctober 3,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38.

㊲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㊳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07页;《警惕苏联破坏阿拉伯团结》,《人民日报》1978年11月8日,第6版。

㊴《美、埃、以戴维营会议结束埃及人民支持萨达特总统为中东和平作努力》,《人民日报》1978年9月19日,第6版。同时,对于中国拒绝攻击萨达特的立场,巴解组织显然并不满意。Yitzhak Shichor, "'Just Stand' and 'Just Struggle': China and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5, 1981, pp. 44-45.

㊵《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s://www.gov.cn/govweb/test/2009-10/13/content_1437683.htm, 2023-09-10。

㊶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29, 19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204.

⑤ Yaakov Katz, Amir Bohbot, *The Weapon Wizards: How Israel Became a High-Tech Military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7, pp. 222-223.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ly 19, 197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VIII, Arab-Israeli Dispute, January 1977-August 1978, No. 53.

⑦ Abba Gefen, *Israel at a Crossroads*, Jerusalem: Gefen Books, 2001, p. 183.

⑧中央军委办公厅编:《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88、155-156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78页。

⑩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28, 198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1-1988, Volume III, Soviet Union, January 1981-January 1983, No. 90; 孙肇卿:《西天取“睛”——歼-7M研发及出口经验总结》,《航空档案》2007年第5期。

⑪ Yitzh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Vol. 40, No. 1, 1998, p. 74.

⑫ Yitzhak Shichor,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st: Ernst David Bergmann and Israel's Role in Taiwan's Defense", *The Asia Papers*, No. 2, 2016, pp. 21-23.

⑬“军资组组长温哈熊与以色列飞机制造公司驻美代表就幼狮战斗机售我有关事宜之谈话记录”,1978年6月2日,(中国台湾地区)“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005-010202-00168-001,第2-9页。

⑭“以色列航空工业总裁G. Gidor赠蒋经国圣经”,1978年11月25日,(中国台湾地区)“国史馆”档案史料文物,005-010504-00049-001,第2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6,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51.

⑮在亚洲拥有广泛商业网络的犹太商人索尔·艾森伯格

(Saul Eisenberg)为这次秘密访问提供了他的私人飞机,并为团队成员组织了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行前培训课程。Yitzhak Shichor, "My Heart Is in the West and I Am at the Ends of the East: Changing Israeli Perceptions of Asia", in Alfred Wittstock(ed.), *The World Facing Israel-Israel Facing the World: Images and Politics*, Berlin: Frank & Timme, 2011, pp. 253-254.

⑯ Yaakov Katz, Amir Bohbot, *The Weapon Wizards*, pp. 222-224.

⑰ Yaakov Katz, Amir Bohbot, *The Weapon Wizards*, pp. 224-225. "Memorandum From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rade Negotiations(Strauss)to President Carter", June 6, 19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HI, China, No. 249;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Holbrooke)to Vice President Mondale", undat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258.

⑱李周书:《中国战机军售第一单——从无偿援外到军售》,《航空档案》2005年第1期。

⑲随着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中东武器市场很快将出现历史性的增长。

⑳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ay 21, 197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No. 109.

㉑《促进阿拉伯和非洲合作增强抗击侵略的能力沙特阿拉伯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人民日报》1978年9月22日,第6版。

㉒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Saudi Arab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4, 197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VIII, Middle East Region; Arabian Peninsula, No. 177.

㉓曾琼叶:《铁翼雄鹰:大漠计画口述历史》,台北:(中国台湾地区)“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10年;罗添斌:《失落的大漠中队:“中华民国”空军的秘密任务》,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

㉔ Jasser Alsagri, "alealaqat alsueudiat-alsiynia...80 eaman min alshirakat walmasalih alkubraa", Al Riyadh, <https://www.>

alriyadh.com/1739632, 2023-09-15.

⑦ "1979: Israel and Egypt Shake Hands on Peace Deal", BBC,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march/26/newsid_2806000/2806245.stm, 2023-09-12.

⑧ Gregory Gause III,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 in Raymond Hinnebusch, Anoushiravan Ehteshami(ed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 206-207.

⑨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07页;《姬鹏飞在欢迎法胡姆主席的宴会上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国政府代表何英副外长同法胡姆主席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第4版。

⑩《外电报道:特鲁多谈邓副总理同他的谈话》,《参考消息》1979年9月27日。

⑪ 李周书:《中国战机军售第一单》,第49页;《穆巴拉克副总统到我国访问邓小平副总理、乌兰夫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人民日报》1980年1月6日,第1版。

⑫《色厉内荏的行动》,《人民日报》1980年8月5日,第6版。

⑬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78(1980)of 20 August 1980", [https://undocs.org/S/RES/478\(1980\)](https://undocs.org/S/RES/478(1980)), 2023-09-12.

⑭《中国穆斯林强烈谴责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设施》,《中国穆斯林》1981年第1期。

⑮ 忻悻:《卡特政府的对华技术转让与军售政策》,《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

⑯ Michael Schaller, "Reagan and Asia", in Andrew Johns (ed.), *A Companion to Ronald Reaga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5, pp. 413-418; 1982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就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中美达不成协议,中国应该做好双边关系倒退到1978年之前甚至1972年之前的准备。《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先念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⑰《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写:《李

先念年谱》,第135页。

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1-712页。

⑲ 中国派驻埃及的军事专家张宝玉也在这场袭击中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塔列布和穆巴拉克分别接见姬鹏飞姬鹏飞向张宝玉同志墓献花圈》,《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2日,第6版。

⑳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07页。

㉑《必须立即扼住贝京的血手》,《人民日报》1982年9月20日,第6版。

㉒《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5-417页。

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858-859页。

㉔ Alexander Pantsov,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382-384.

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㉖ 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㉗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he August 17, 1982 U.S.-China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81-1988/china-communicue>, 2023-09-10.

㉘《岁暮漫谈美国外交》,《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第6版。

㉙ Azriel Bermant, "Why Reagan's Middle East Record Was Dismal",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reagans-middle-east-record-was-dismal-18022>, 2023-09-12.

㉚ Naseer H. Aruri, Fouad M. Moughrabi, "The Reagan Middle East Initiativ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2, No. 2, 1983, pp. 10-30.

㉛《急骤动荡的一年——对中东形势的回顾》,《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8日,第7版。

㉜《年终漫谈美国外交》,《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8日,

第7版。

⑨ Yaakov Katz, Amir Bohbot, *The Weapon Wizards*, p. 225.

⑩ 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官方也基本不再使用或宣传“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道路”的说法。

⑪ 《为解决历时三十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沙特阿拉伯提出实现中东和平七点建议》,《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第1版。

⑫ "Text of Final Declaration at Arab League Meeting", *New York Times*, 1982-09-10.

⑬ 《加强团结坚定方向奋勇前进》,《人民日报》1982年9月12日,第6版。

⑭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72-174页。

⑮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74页。

⑯ 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75-179页。

⑰ 吴志菲:《时延春和他的四十年中东情》,《观察与思考》2007年第4期。

⑱ 1983年由侯赛因国王亲自驾机,一支由76位约旦政府官员和商界精英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再次抵达北京。双方就增加对约旦磷矿、钾盐矿产采购,以及鼓励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安惠侯等主编:《丝路新韵》,第177页。

⑲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From "Aligning with the US to Contain the USSR" to an Independent Regional Peace Policy: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1977-1982)

She Gangzheng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Soviet Union's global strategic expansion in the mid-to-late 1970s, China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olicy propositions on the Middle Eastern issue based on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aligning with the US to contain the USSR". China proactively supported the efforts of regional countries to break away from Soviet control, questioned and boycotted the Geneva Conference mechanism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served as co-chairmen, and repeatedly warne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 must balance the demands of both parties when promoting peace among the Arabs and the Israelis. Such a series of positions and activities by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launch of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prom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rocess, China's relations with key regional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 1980s, while China was reconsider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both superpowers and the Third World, the US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expose its limitations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in an objective and fair way. A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aking the initiative to bid "a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China firmly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an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for the regional peace. By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with all parties in the Middle East, China started looking for its own role in supporting this region to achieve lasting peace, universal secur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Global Cold War; Arab-Israeli Conflict;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ligning with the US to Contain the USSR";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